

· 美国与中东非洲关系 ·

双向博弈：美国与叙利亚库尔德武装力量的 委托-代理关系（2014~2020年）*

文少彪 刘中民

内容提要 利用当地代理人武装打击恐怖主义是美国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叙利亚，由于担心深陷反恐战争的陷阱，美国拒绝部署大规模地面部队来应对“伊斯兰国”的威胁，而是转向“幕后领导”策略，利用库尔德武装执行地面战斗任务，但这种委托-代理关系未能维系下去。首先，利益匹配与“赋能”激励促成委托-代理关系。2014年“伊斯兰国”的崛起日益促成美国和叙利亚库尔德人的共同利益，美国逐渐加大对后者进行“赋能”激励，提升后者的积极性和作战能力。其次，利益分化与“去能”激励导致委托-代理关系产生分歧。当“伊斯兰国”被极大地削弱后，双方之间的利益分歧加剧，美国开始对叙利亚库尔德武装进行“去能”，以限制后者不断增长的实力和自主性。最后，监督困境导致委托-代理关系趋于瓦解。由于信息不对称和代理人武装碎片化的结构，美国很难对叙利亚库尔德武装施加有效的监督，致使后者存在懈怠和偏离行为的空间。随着打击“伊斯兰国”的行动进入尾声，美国不再顾及叙利亚库尔德人的利益，这迫使后者从美国的对手俄罗斯和巴沙尔政权那里寻求新的安全庇护，这种微妙的偏离折射出代理人战争的潜在隐患和代理关系的脆弱性。事实表明，代理人策略存在的利益分化、激励和监督困境始终是运作代理人战争的固有“软肋”。

关键词 叙利亚战争 美国 叙利亚库尔德武装 委托-代理关系 双向博弈 “伊斯兰国” 代理人自主性

作者简介 文少彪，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刘中民，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

* 本文系2021年上海外国语大学校级一般项目（41004576）的阶段性成果。

一 导论：问题的提出

伴随2011年美军从伊拉克撤军以及阿拉伯剧变的爆发，极端组织从中东地区的混乱中找到生存、发展空间。到2014年初，“伊斯兰国”的活动重心逐渐从伊拉克转移到叙利亚境内并建都拉卡（Raqqa），建立所谓的“哈里发国家”。为挫败“伊斯兰国”掀起的恐怖主义浪潮，奥巴马的反恐战略要点是：不派遣大规模地面部队；结合持续的空袭和特别行动，支持当地伙伴的能力建设；避免代价高昂并适得其反的军事干预。^①在斯蒂芬·比德尔（Stephen Biddle）等学者看来，这是一种利用“轻足迹”（small footprint）的安全力量援助代替大规模地面部队的设想，反映了美国打击“伊斯兰国”的战略构想。^②所谓“安全力量援助”，指美国向当地伙伴提供训练、武器、技术和空中力量支持，试图使后者有更多的能力和意愿帮助自己以更低的成本解决麻烦，从而避免直接的深度卷入。鉴于小布什政府在中东的战略透支，奥巴马和特朗普政府持续推动中东战略收缩，并将全球战略重心转向亚太，力图摆脱“永久战争”泥潭，避免发动由美国承担过多责任的常规地面战争。^③在叙利亚的血腥战场，美国提出了一种更低成本、更便利、更有吸引力的代理人战争方案——由叙利亚库尔德武装（简称“叙库武装”）代替美国常规部队开展地面战斗。^④在打击“伊斯兰国”方面，美国支持库尔德人是

① The White House, “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at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cademy Commencement Ceremony”, <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the-press-office/2014/05/28/remarks-president-united-states-military-academy-commencement-ceremony>, 2014-05-28; Christopher M. Blanchard and Carla E. Humud, “The Islamic State and U. S. Policy”, Report of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January 18, 2017, pp. 14-15.

② Stephen Biddle and Julia Macdonald and Ryan Baker, “Small Footprint, Small Payoff: The Military Effectiveness of Security Force Assistance”, *The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Vol. 41, No. 1-2, 2018, p. 90.

③ Steven A. Cook, “There’s Always a Next Time to Betray the Kurds”, *Foreign Policy*,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9/10/11/kurds-betrayal-syria-erdogan-turkey-trump>, 2019-10-11; 钮松：《空袭ISIS：美国难以从中东“转身”》，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8月13日；牛新春：《中东政治演进的特点》，载《现代国际关系》2021年第2期，第1~10页。

④ 叙利亚库尔德武装在本文中泛指叙利亚库尔德民主联盟党（PYD）的下属军事组织人民保护军（YPG）、妇女保护军（YPJ），以及受库尔德武装领导的混合部队叙利亚民主军（SDF）。叙利亚民主军以人民保卫军为主力（2.5万人左右），并吸纳叙利亚阿拉伯联盟（约3000~5000人）。

“一项低成本、高回报的投资”。^① 但是，美国能否达成目标主要依靠当地代理人的努力和能力，“因为美军通常不会参与地面作战，而是充当顾问和推动者”。^② 关于这场反恐代理人战争，有两个交织在一起的进程需要被正视：一方面，美国加大对叙库武装的训练、武器供应和空中掩护等多种形式赋能援助，后者逐渐成为打击“伊斯兰国”的高效地方代理武装；另一方面，美国与叙库武装之间存在复杂的博弈和张力，并从合作走向疏离。为什么双方关系会出现这种转变？双方的代理困境是如何产生的？

（一）研究述评

国内外学界围绕叙利亚战争中美国与叙库武装关系问题，主要有4种解释。第一是代理人“次优”论。罗德·桑顿（Rod Thornton）指出，在叙利亚的复杂环境中，“所有试图利用代理人来谋划任何特定战略结果的外部施动方，都将不可避免地面临相当大的困难。西方大国和库尔德人的关系也是如此。前者无疑将不得不应对后者作为对抗‘伊斯兰国’的代理人导致的许多意外后果”。^③ 对美国而言，库尔德人被证明是打击“伊斯兰国”的最有效代理人，支持库尔德武装有一定价值，但在实践中，这种支持对美国的危害可能比预期的更大，后者追求联邦主义下的自治（要求叙利亚实行联邦制，库尔德人实现自治），持反抗土耳其的立场，与巴沙尔政权、俄罗斯的微妙关系以及被指控滥用暴力都给代理关系埋下隐患。^④ 尽管学界预料到美国利用库尔德人的隐患，但这是基于经验的认识而非理论视角。

第二是土耳其干扰论。美国将叙库武装发展为打击“伊斯兰国”的代理人，但是“库尔德问题是阻碍美土关系发展的首要因素”，美国不得不顾及土耳其在叙利亚问题、美国中东战略和北约框架中至关重要的地位。^⑤ 叙库武装

① Jason Motlagh, “The Betrayal of the Kurds”, *Rollingstone*, <https://www.rollingstone.com/politics/politics-features/trump-betrayal-of-the-kurds-927545>, 2019-12-18.

② Seth G. Jones etc., “Rolling Back the Islamic State”, *RAND*, 2017, p. 63.

③ Rod Thornton, “Problems with the Kurds as Proxies against Islamic State: Insights from the Siege of Kobane”, *Small Wars & Insurgencies*, Vol. 26, No. 6, 2015, pp. 865-885; Hanaa Hasan, “What is behind the US’ Support of the YPG?”, *Middle East Monitor*, <https://www.middleeastmonitor.com/20180130-what-is-behind-the-us-support-of-the-ypg>, 2018-01-30.

④ Barak Barf, “Ascent of the PYD and the SDF”, *The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 No. 32, <https://www.washingtoninstitute.org/policy-analysis/ascent-pyd-and-sdf>, 2016-04-07.

⑤ 魏敏：《中东变局下美国与土耳其关系变化及前景》，载《当代世界》2021年第3期，第46~51页；汪波、穆春唤：《叙利亚库尔德人内战前后的政治发展》，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8年第2期，第98~100页。

在打击“伊斯兰国”过程中发展壮大，加剧了土耳其对叙利亚北部局势的安全焦虑，也迫使美国对叙库武装的政策从支持转向限制。^① 基于常识，土耳其很自然地被视为干扰美国与叙库武装关系的第三方因素，但是学界并没有深入剖析土耳其因素如何影响美国与叙库武装的双向博弈。

第三是非对称依赖论。史蒂芬·库克（Steven A. Cook）认为，美国总是利用完库尔德人后就抛弃后者，而库尔德人很软弱，总是会回到美国身边，因为他们几乎没有其他选择。^② 约书亚·基廷（Joshua Keating）认为，美国抛弃库尔德人并不奇怪，而后者基于过去的历史也并非不知道这种风险，之所以充当代理人是因为他们别无选择。^③ 鉴于实力相差悬殊，学界在观察美国与叙库武装代理关系时，往往不自觉地倒向“施动方中心”视角，导致代理人的自主性被忽视，进而得出美国随时可以抛弃叙库武装而不担心后果的片面认识。

第四是实用主义论。美国在叙利亚没有清晰的战略目标，利用叙库武装打击“伊斯兰国”更像是短期策略，叙利亚库尔德人不过是美国的“任务型盟友”。^④ 对双方而言，“合作都是暂时利益的结合”“美国对库尔德人采取了一种以临时政治需要为核心的功利主义政策”。^⑤ 这类实用主义观点尽管指出了美国与叙库武装之间的短暂利益和动态关系，但没有细致地分析二者的利益分化过程以及利益分化对代理关系造成的影响。

总体而言，学界对美国与叙库武装的关系研究尚十分有限，既有成果多为政策分析，虽有助于深化经验认知，但缺乏系统性理论论述。与此同时，既有研究很少关注美国与叙库武装代理关系背后的双向博弈。此外，既有研究对美国在叙利亚打击“伊斯兰国”的叙事过于粗略，不能很好地反映出这场反恐战争的复杂性。

（二）“委托—代理”理论：叙利亚战争中美国与叙库武装关系的一个解释框架

美国利用叙库武装打击“伊斯兰国”是美国干涉叙利亚内战的一个“切

① 刘辰、马晓霖：《土耳其叙北安全区政策的动因与走向分析》，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20年第6期，第31~43页。

② Steven A. Cook, “There’s Always a Next Time to Betray the Kurds”, *Foreign Policy*, October 11, 2019.

③ Joshua Keating, “The Foreseeable Tragedy of Rojava”, *Slate*, <https://slate.com/news-and-politics/2019/10/rojava-kurdish-enclave-syria-doomed-start-turkey-trump.html>, 2019-10-14.

④ Lara Aziz, “The Syrian Kurds in the US Foreign Policy: Long-term Strategy or Tactical Ploy?”, *Analyse Report of Centre d’étude des crises et conflits internationaux*, No. 66, 2020, p. 23.

⑤ 周鑫宇：《美国对库尔德独立问题的政策及其发展前景》，载《现代国际关系》2017年第10期，第42页。

片”，探究这个“切片”所承载的复杂信息，有助于呈现美国在叙利亚运作代理人战争的策略和困境。为深化和规范相关研究，本文尝试运用“委托-代理”理论（Principal-Agent Theory）对美国与叙库武装在2014~2020年间的关系进行系统考察。在正当（licit）代理情形中，代理人因具备专业优势被授权来解决繁琐问题，以期实现“增效节支”的目的。但事与愿违的是，代理人普遍利用自身的优势谋求私利，以至于道德风险、逆向选择和懈怠等现象难以杜绝。对此，迈克尔·詹森（Michael C. Jensen）和威廉·梅克林（William H. Meckling）认为，在公司运营过程中，委托人与代理人的利益、动机不一致以及信息不对称是代理成本（agency cost）产生的主要原因。^①为降低代理成本，识别和管控代理人的偏离行为就成为代理理论的重要关切点。在代理人战争情形下，代理人拥有地方知识优势（包括对本土传统、社会网络、地形地貌等方面的深入理解）和特殊价值（包括非外部入侵者身份、“脏手”角色、合理推诿等）而受到施动方青睐。但是，施动方在运作代理人战争的过程中，不得不应对管控代理人自主性（包括懈怠、偏离等）的难题。对此，丹尼尔·拜曼（Daniel Byman）指出：“尽管代理人有许多优势，但他们经常让施动方失望。当地的组织不懂得感激和顺从，他们往往走自己的路，追求自己的利益，同时把得到的金钱和其他支持装入自己的腰包”。^②可以说，代理人谋求自主性是一种本能，这也为委托-代理关系双向博弈注入了持久的动力。因此，委托-代理理论的基本逻辑和分析框架不断从正当情形向非正当情形扩展，并被引入到代理人战争研究领域，形成理论通约现象。^③

国际关系学界侧重运用“委托-代理”理论分析以下问题：施动方与代理人利益不一致；管控代理人难题；代理人拓展自主性（如“尾巴摇狗”现象，The tail wagging the dog）；代理人战争的“软肋”（weakness）和长期风险，学界常用“回火”（back-fire）、“反吹”（blow-back）、“双刃剑”

① Michael C. Jensen and William H. Meckling, “Theory of the Firm: Managerial Behavior, Agency Cost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Vol. 3, No. 4, 1976, p. 308.

② Daniel Byman, “Approximating War”, *The National Interest*, September/October, 2018, p. 10.

③ 正当（licit）代理关系与非正当（illicit）代理关系是相对的价值判断，并非严格的客观划分。正当代理关系通常是指符合法律和道德规范的授权，其中委托人与代理人的权责和义务划分非常明晰。例如在国家治理、公司治理、国际组织、司法等领域都存在大量的代理现象。非正当代理关系则通常是指不受法律和道德规范约束的非正式授权，其中委托人与代理人的权责和义务划分非常模糊。例如代理人战争几乎不是依照法律与道德规范进行的，被普遍视为不正当的冲突形式。尽管二者存在一定的区别，但是委托-代理的方法论和基本原理是通用的。

(double - sword) 等词来形容代理人的反噬行为。^① 相关学者主要包括阿莫斯·福克斯 (Amos C. Fox)、伊莱·伯曼 (Eli Berman) 和大卫·莱克 (David A. Lake) 等, 他们将代理人战争置于“委托 - 代理”理论视角下进行研究, 其研究表明: 尽管共同利益是维系代理关系的基础, 但施动方与代理人都优先关注自主利益与可承受的风险。为缓解委托 - 代理关系的内在矛盾, 施动方需要根据利益匹配情况建立适当的激励和监督机制来调节利益分歧, 否则代理人可能谋求懈怠或偏离。^② 斯蒂芬·比德尔 (Stephen Biddle) 运用委托 - 代理框架评估美国对当地伙伴提供安全力量援助的效果。他认为, 利益和信息不对称等问题造成美国的安全力量援助出现系统的、根深蒂固的代理损失。^③ 罗伯特·鲍威尔 (Robert Powell) 利用委托 - 代理框架分析了代理人“租金”问题。他认为施动方与代理人之间存在“无止境博弈” (an infinite - horizon game): 代理人也许能够高效地代替施动方处理问题, 但是这会导致施动方承诺的未来收益可能无法得以兑现, 为获取持续的代理“租金”, 代理人故意拖延进而延长施动方对它的需要。^④

综合以上论述可以发现: 一是施动方与代理人的关系不是简单的单向“输出 - 执行”模式, 而是难以控制的双向博弈, 这一特性增加了代理人战争的复杂性和潜在风险; 二是利益、激励与监督是理解代理人战争的三个重要维度, 其中利益匹配情况是影响代理关系的关键变量; 三是施动方在管控委托 - 代理关系的过程中面临系统性挑战。

^① “尾巴摇狗”现象是指在国际政治中出现强大的一方反而被弱小的一方操纵, 出现“主从关系”颠倒的窘境。例如, 冷战时期, 苏联的东欧“卫星国”反过来利用美苏矛盾来影响苏联的政策。“回火”“反吹”“双刃剑”主要是施动方在利用代理人的过程中反遭到后者侵害, 这些现象表明代理关系中所隐含的风险。

^② Amos C. Fox, “Conflict and the Need for a Theory of Proxy Warfare”, *Journal of Strategic Security*, Vol. 12, No. 1, 2019, p. 57; Stephen Biddle, “Building Security Forces & Stabilizing Nations: The Problem of Agency”, *Daedalus*, Fall 2017, pp. 126 - 135; Stephen Biddle, Julia Macdonald and Ryan Baker, “Small Footprint, Small Payoff: The Military Effectiveness of Security Force Assistance”, pp. 90 - 132; Eli Berman, David A. Lake, Gerard Padró Miquel and Pierre Yared, “Principals, Agents and Indirect Foreign Policies”, in Eli Berman and David A. Lake edited, *Proxy Wars: Suppressing Transnational Violence through Local Agent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9, pp. 1 - 27.

^③ Stephen Biddle, “Building Security Forces & Stabilizing Nations: The Problem of Agency”, *Daedalus*, Vol. 146, No. 4, 2017, pp. 126 - 135; Stephen Biddle, Julia Macdonald and Ryan Baker, “Small Footprint, Small Payoff: The Military Effectiveness of Security Force Assistance”, pp. 90 - 132.

^④ Robert Powell, “Why Some Persistent Problems Persis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113, No. 4, 2019, pp. 980 - 996.

基于以上认识，本文以“委托-代理”的双向博弈过程为分析框架，将利益、激励与监督三个维度嵌入其中，试图搭建起一个更平衡、更开放的分析架构，侧重就美国与叙利亚库尔德武装的委托-代理关系从紧密合作走向疏远的根源进行新的解释：其一，当双方利益匹配时，美国倾向采取“赋能”（empowerment）激励策略，即通过向叙库武装提供包括空中掩护、武器和资金、政治支持和安全庇护等各种形式的援助，提升后者的意愿、资源和战斗效能，以便后者高效地开展特定的代理议程；其二，双方利益出现分化后，美国倾向于采取“去能”（decapacitation）限制策略，即削减对叙库武装各种援助，乃至以背叛、抛弃、疏远的方式限制“叙库武装”开展自主行动的能力和动机，迫使后者回到可控的轨道；其三，鉴于利益分化和“去能”限制，美国难以对叙库武装产生有效力的监督，管控代理关系的能力将被削弱，后者被迫或主动做出偏离行为。总之，美国与叙库武装的双向博弈及其面临的代理人战争困境表明，美国在运作代理人战争的过程中，始终无法克服委托-代理博弈的结构性矛盾和代理人战争固有的“软肋”。

二 利益匹配与“赋能”激励（2014~2017年）

在代理人战争中，利益匹配（interests alignment）是指施动方的偏好恰好符合代理人的利益，即达成特定目标对施动方与代理人都很有好处。“施动方和代理人之间利益或目标一致是最重要的”，利益能否契合是施动方与代理人形成良好互动并有效达成目标的关键。^① 由于施动方与代理人的实力相差悬殊，以至于施动方必须向代理人提供武器、资金等各种资源来帮助后者提高生存和作战能力。否则，施动方就很难影响和管控代理人的行为，代理人也没有能力和意愿去履行约定的任务。只有当双方认为那样做符合他们的利益时，前者才会向后者提供军事或经济援助，后者才会接受前者的安排。^② 因此，“赋能”激励是在双方对彼此的利益是否匹配做出评估之后的选择，而非代理关系形成

^① Bertil Duner, “Proxy Intervention in Civil Wars”,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18, No. 4, 1981, p. 356; Eli Berman, David A. Lake, Gerard Padró Miquel and Pierre Yared, “Principals, Agents, and Indirect Foreign Policies”, pp. 3-4; 陈翔：《大国竞争时代的美国代理人战略》，载《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20年第1期，第11~12页、第22页；陈翔：《内战为何演化成代理人战争》，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1期，第36页。

^② [美国] 斯蒂芬·沃尔特著：《联盟的起源》，周丕启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9页。

的起因。为应对“伊斯兰国”的威胁，时任美国国防部长什·卡特（Ash Carter）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上阐明了战略方针：击败“伊斯兰国”必须通过“赋能”当地力量来实现，而非用美军取代后者。^① 美国通过“赋能”激励提升了叙库武装的反恐能力和意愿，也从后者的高效表现中收割了“战果”。

（一）应对共同威胁：美国与叙库武装联手

“伊斯兰国”旨在打破国界，建立一个逊尼派主导的“哈里发”全球帝国，通过“进攻性圣战”控制领土，塑造“哈里发”实体，在理论和实践上否认中东国家领土边界的合法性。^② 这种否定国家主权规范的极端“圣战”纲领，严重威胁国际体系尤其是基于民族国家主权的国际关系准则。“伊斯兰国”利用中东乱局迅速崛起，到2015年形成一个横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准国家”形态，控制了从伊拉克西部到叙利亚东部大片地区和石油资源，甚至在其控制范围内获得了“征税权”，每年攫取超过10亿美元的财富，吸引了100多个国家约4万名激进分子前往中东参加所谓“圣战”，其中包括6600多名西方公民。^③ 与此同时，“伊斯兰国”还通过互联网传播极端思想，提升全球动员力，其分支网络和恐怖行动进一步向中东、欧洲、北美、非洲、中亚、东南亚等地区的十几个国家拓展。2015年11月，“伊斯兰国”制造的巴黎恐袭事件震惊了国际社会。对此，美国中情局前高官詹姆斯·克拉珀（James R. Clapper）指出：“‘伊斯兰国’之所以成为最突出的恐怖主义威胁，是因为它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建立了自己的‘哈里发’国，在其他国家建立了分支机构，而且它越来越有能力对全世界范围内的目标发动袭击”。^④ 随着“‘伊斯兰国’的威胁不断外溢，以及推翻它的难度和成本日益增加，美国和西方盟友明显意识到这是一个迫在眉睫的威胁。

“伊斯兰国”针对美西方的策略是：向美国和其他国家发出挑战，迫使它们发动地面会战，试图把包括美国在内的对手拉入更直接的冲突，通过对抗

^① Ashton Carter, Hearing before the Committee on Armed Services U. S. Senate, S. Hrg. 114 - 647, U. S. Government Publishing Office, April 28, 2016, pp. 4 - 12.

^② 刘中民、郭强：《伊斯兰哈里发制度：从传统理想到现实困境》，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3期，第111~113页。

^③ Office of the 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 (ODNI), *Worldwide Threat Assessment of the U. S. Intelligence Community*, Senate Armed Services Committee, Feb. 9, 2016; Brett McGurk, “Hard Truths in Syria”, *Foreign Affairs*, Vol. 98, No. 3, 2019, pp. 69 - 84.

^④ James R. Clapper, “Statement for the Record: Worldwide Threat Assessment of the US Intelligence Community”, Testimony before Senate Select Committee on Intelligence, Feb. 9, 2016, p. 4.

消耗敌人。^① 如果美国发起大规模常规战，其成本和风险无疑非常高，主要包括阿富汗与伊拉克战争后美国国内反战情绪、战争的经济代价高昂、战后重建成本巨大、中东国家反美主义浪潮高涨等。^② 在此背景下，“除非美国人、美国财产受到大规模直接攻击，否则美国不可能再打一场大规模中东战争，这是战略转型期最重要、最突出的变化”。^③ 鉴此，奥巴马政府采取了代理人战略，认为与当地伙伴合作是对付恐怖分子的最佳选择，可以作为大规模直接军事行动的替代方案。为落实这一战略，2014年8月五角大楼发起“固有决心”行动（CJTF-OIR），相对于常规部队的“重装出击”，这是一个以依赖地面代理人为主、以空中打击为辅的“轻度回击策略”：以美国空军为主，联合特种部队、情报部门为当地伙伴提供支援，由后者去解放被“伊斯兰国”控制的领土和人口。这些举措可以加强美国在叙利亚的军事影响并维持美国“轻足迹”的优势。从本质上看，美国试图利用“平行代理人战争”来规避风险和成本。^④

此外，美国国防部运作的“温和叛军项目”失败也促使美国转向与叙库武装合作。2014年末，美国国防部在约旦、土耳其运行“训练和装备项目”，旨在扶植一支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叙利亚“温和叛军”来对付“伊斯兰国”，但该计划最终走向失败，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俄罗斯日益强势介入叙利亚战争，并质疑美国资助的“温和叛军”是打着反“伊斯兰国”旗号反巴沙尔政权，因而遭到俄罗斯无差别空袭。二是“温和叛军”自身资质存在问题。它是一个松散的组织，其内部充斥着大量仇视美国和受“圣战”极端思想吸引的成员，其中一些团体向“努斯拉阵线”“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投降和转让武器，导致美军打造一支可靠叛军的努力终归失败。2015年10月，奥巴马政府不得不暂停这个由国防部主导的代理人项目。

与此同时，叙利亚库尔德人的安全与利益也日益遭到“伊斯兰国”威胁。随着“伊斯兰国”的扩张，库尔德人在叙利亚北部和东北的聚集区不断遭到侵袭，2014年8月，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发布关于叙利亚问题的调查报告指出，“伊斯兰

^① Christopher M. Blanchard and Carla E. Humud, “The Islamic State and U. S. Policy”, Report of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Jan. 18, 2017, p. 6.

^② Emma Ashford, “Dealing with ISIS in Iraq and Syria”, *Cato Handbook For Policymakers*, 8th edition, 2017, pp. 88 - 90.

^③ 牛新春：《中东政治演进的特点》，第4页。

^④ 安德鲁·芒福德将施动方采取“空中为辅，地面为主”的交互作战方式称为“平行代理人战争”。See Andrew Mumford, *Proxy Warfare*, UK: Polity Press, 2013, p. 25.

国”对库尔德社区犯下严重罪行，“周五往往是在公共广场处决、截肢和鞭笞的日子”，包括儿童在内的平民被强迫观看，那些被杀害者的尸体往往会被展览数日，以恐吓当地人民；妇女因不遵守“伊斯兰国”着装要求遭到鞭笞；在拉卡，最小仅有10岁的儿童被征召进入“伊斯兰国”营地训练；“伊斯兰国”强迫叙利亚北部的库尔德社区迁离。^①此外，“伊斯兰国”不断威胁叙利亚库尔德人的经济利益。

在上述背景下，美国与“叙库武装”不断接近。美国重新找到了能够代替它在叙利亚有效作战的组织。2015年“伊斯兰国”在科巴尼首次大败之后，“美国认为库尔德人是打击‘伊斯兰国’的唯一有效、值得信赖的地面盟友”，库尔德人奉行世俗、民主和性别平等价值，被美国认为是“很容易驾驭的群体。”^②约瑟夫·沃特指出：“库尔德人可能是美军能在那个地区找到的最接近西方伦理思想的伟大战士”，是美国最可靠的地面代理人。^③

（二）“赋能”：叙库武装的优异表现

“伊斯兰国”的威胁促成了美国与叙库武装联手，后者也因此获得了美国提供的空中掩护、武器、金钱、训练、顾问等各种形式的援助，这些援助明细在2015~2017财年的国防授权法案中有所披露。^④与此同时，为辅助叙库武装对“伊斯兰国”开展地面作战，2015年10月，美国向叙利亚北部地区派遣约50名特种兵；2016年7月，奥巴马再次下令向拉卡近郊增派3000名特种兵；2015年至2016年间，美军对“伊斯兰国”目标发动了超过1.2万次空袭。^⑤除此之外，更受叙库武装欢迎的是政治赋能。2015年4月，美国与

^① Human Rights Council, “Report of Independent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Inquiry on the Syrian Arab Republic” (A/HRC/27/60), https://www.ohchr.org/Documents/HRBodies/HRCouncil/CoISyria/A.HRC.27.60_Eng.pdf, 2014-08-13.

^② Joshua Keating, “The Foreseeable Tragedy of Rojava”, *Slate*, <https://slate.com/news-and-politics/2019/10/rojava-kurdish-enclave-syria-doomed-start-turkey-trump.html>, 2019-10-14.

^③ Howard Altman, “Cut off from US help, Kurds Fighting a Desperate Battle against Turkey on their Own”, *Military Times*, <https://www.militarytimes.com/news/your-military/2019/10/10/cut-off-from-us-help-kurds-fighting-a-desperate-battle-against-turkey-on-their-own-says-a-former-commando-who-describes-himself-as-disillusioned-and-embarrassed>, 2019-10-10.

^④ NDAA, FY2015, PUBLIC LAW 113-291—DEC. 19, 2014; FY2016, PUBLIC LAW 114-92—NOV. 25, 2015; FY2017, PUBLIC LAW 114-328—DEC. 23, 2016; Christopher M. Blanchard and Carla E. Humud, “The Islamic State and U. S. Policy”, Report of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Jan. 18, 2017, pp. 9-13.

^⑤ Emma Ashford, “Dealing with ISIS in Iraq and Syria”; “Islamic State and the Crisis in Iraq and Syria in Maps”, *BBC New*, <https://www.bbc.com/news/world-middle-east-27838034>, 2018-03-28.

叙库武装进行接触，商讨扩大行动范围，在叙利亚库尔德地区以外的阿拉伯地区与“伊斯兰国”作战，包括“伊斯兰国”首府拉卡和代尔祖尔（Deir Ezzor）省。库尔德人突破他们的传统家园势必引起猜疑，叙利亚反对派武装“叙利亚自由军”警告“人民保卫军”不要侵入阿拉伯人领地。因此，叙库武装最高指挥官阿布迪向美方提议，“为了解放这些地区，他需要寻求阿拉伯部落酋长的支持，并在他的民兵组织中组建一个阿拉伯分支，因为纯粹的库尔德民兵是不受欢迎的”。^① 2015年10月，美国国防部特别行动小组最终协调库尔德武装与“叙利亚阿拉伯联盟”（SAC）、土库曼和亚述分支合并成新的“叙利亚民主军”（SDF，简称“民主军”），为库尔德武装的扩张创造了政治条件且规避了敏感性。

美国的“赋能”激励换取了叙库武装的优异表现。在美国的支持下，叙库武装打击“伊斯兰国”地面行动进展十分迅速。叙库武装领导的地面战斗使叙利亚东北部、北部数万平方英里土地和数百万人摆脱了“伊斯兰国”的控制，为此他们牺牲了近1.1万人；相比之下，美军死亡人数不到9人。^② 在此过程中，美国与库尔德人在叙利亚的广阔战场上建立起相互依靠的“前所未有的深层次合作关系”。^③ 此外，叙库武装还成功解放了拉卡。时任打击“伊斯兰国”全球联盟总统特使布雷特·麦格克（Brett McGurk）对叙库武装给予高度评价：“民主军是我们有史以来最好的非常规伙伴力量，它实际上占领了叙利亚1/3的领土，那里曾是伊斯兰‘哈里发’国的中心，而美国为此付出的成本却非常低。民主军不仅清理领土，招募当地人进行管理，而且创造了一个宽松的安全环境，这就是我们能在叙利亚留下非常轻微的美国足迹的原因所在”。^④

在美国的“赋能”激励下，叙库武装在击退“伊斯兰国”方面表现出了

① Robin Wright, “How Trump Betrayed the General Who Defeated Isis”, *New Yorker*, <https://www.newyorker.com/news/dispatch/how-trump-betrayed-the-general-who-defeated-isis>, 2019-04-04.

② “American War and Military Operations Casualties: Lists and Statistics”, Report of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Sept. 24, 2019, p. 24;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Casualty Status”, <https://www.defense.gov/casualty.pdf>, 2019-11-04.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伊斯兰国”的溃败不仅仅归因于美国的干预和叙利亚库尔德人的地面战斗，俄罗斯、叙利亚政府军、伊朗也在其中发挥了作用。但是，“俄叙伊”主要打击活跃于大马士革首都圈附近、叙利亚中部、南部和西北部等范围内的“伊斯兰国”势力，而叙库武装重点打击叙利亚北部、东北部的“伊斯兰国”势力。See Christopher M. Blanchard, Carla E. Humud, Kenneth Katzman and Matthew C. Weed, “The ‘Islamic State’ Crisis and U. S. Policy”,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May 27, 2015, pp. 7-9.

③ 周鑫宇：《美国对库尔德独立问题的政策及其发展前景》，第42~45页。

④ Robin Wright, “How Trump Betrayed The General Who Defeated Isis”.

高效的战斗力，尽管叙库武装为此付出巨大代价，但对美国而言，“这可能是近来所有干预行动中最成功的一次……美国成功地实现了其目标，而且也不是很昂贵的方式”。^①

三 利益分化与“去能”（2017~2020年）

在代理人战争中，利益分化（interests divergence）是指施动方与代理人双方存在不同的目标优先项，继续履行代理议程，但不再符合施动方或代理人各自的利益。代理人战争中的主要风险集中在代理人的动机、战斗方式以及施动方与代理人的战争目标不一致，并时有呈现。^② 施动方与代理人之间的利益分化是普遍而常见的，“尽管存在权力不对称，但代理人几乎总是根据自己的利益和冲动行事。”^③ 双方对彼此的期待是矛盾的，施动方希望代理人顺从并不知疲倦地“卖命”，而代理人则试图将施动方援助资源用于追求自主性目标。就叙利亚战争而言，2017年12月，五角大楼证实“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控制的领土已获解放。^④ 共同威胁被解除后，美国与叙库武装的利益分化逐渐加剧，后者在打击“伊斯兰国”的过程中不断壮大，更有能力和动机谋求自主利益并偏离授权范围。而美国不再积极为叙库武装投入资源，反而倾向采取“去能”激励策略来限制后者的力量发展。

（一）美国与“叙库武装”的利益分化

在削弱“伊斯兰国”势力后，美国针对叙库武装的动机更加复杂。起初，叙库武装的任务被美国限定为专注于击败“伊斯兰国”，但美国军界和政界官员认为，叙库武装可以帮助美国在叙利亚争取更广泛、更复杂的利益。^⑤ 其一，嵌入影响力。美国试图利用库尔德力量与俄罗斯、巴沙尔政权继续展开

^① Henri J. Barkey, “The Future of the Kurds in Syria”, <https://www.cfr.org/conference-calls/future-kurds-syria>, 2019-11-14.

^② Candace Rondeaux and David Sterman, “Twenty-First Century Proxy Warfare: Confronting Strategic Innovation in a Multipolar World”, *New America*, Feb. 20, 2019, p. 20.

^③ Daniel Byman, “Approximating War”, *The National Interest*, September/October, 2018, p. 13.

^④ Saphora Smith and Michele Neubert, “ISIS will Remain a Threat in 2018”, *CNBC*, <https://www.nbcnews.com/storyline/isis-terror/isis-will-remain-threat-2018-experts-warn-n828146>, 2017-12-27.

^⑤ Mark Landler, Helene Cooper and Eric Schmitt, “Trump to Withdraw U. S. Forces From Syria, Declaring ‘We Have Won Against ISIS’”, *New York Times*, <https://www.nytimes.com/2018/12/19/us/politics/trump-syria-turkey-troop-withdrawal.html>, 2018-12-19.

博弈，影响叙利亚战后政治进程，“使美国能够在反恐战争后成为参与叙利亚国内权力分配的有力竞争者”。^①其二，遏制伊朗。在“伊斯兰国”实力被大幅削弱的情况下，美国的新使命是破坏伊朗构建穿越伊拉克、叙利亚和黎巴嫩的陆上通道的努力，这是美国的重要关切点。面对伊朗在叙利亚发展代理人网络，时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坚持要求清除伊朗的渗透。^②全球打击“伊斯兰国”联盟特使詹姆斯·杰弗里（James F. Jeffrey）指出：“库尔德人是击败‘伊斯兰国’临时的、战术的和交易的手段。现在我们需要他们来遏制伊朗”。^③其三，巩固反恐成果。美国防长卡特很清楚，打击“伊斯兰国”需要“持久方法”，任何军事上取得的进展都必须主要依赖当地力量的后期维持和治理。^④截至2019年，“伊斯兰国”在哈金（Hajin）地区仍有2000名至2500名武装分子，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总共有2万到3万名地下战士。^⑤在这种情形下，美国需要依赖叙库武装巩固与“伊斯兰国”作战五年的成果。其四，控制油气资源。“伊斯兰国”溃败后，叙利亚东北的油田基本被民主军控制，该地区石油产量约占总量的50%~70%，控制这些油田相当于控制了叙利亚的能源和财富。2019年10月初，美军保留500~600名士兵，觊觎当地丰富的油田。2020年8月，美国石油企业与库尔德武装达成交易合同，证实了美国抢占叙利亚东北地区石油资源的图谋。

在打击“伊斯兰国”过程中，叙库武装也在滋生自身的利益动机。其一，扩大自治区。叙利亚库尔德人长期处于边缘化、被打压的境地，根本没有施展“拳脚”的空间。参与打击“伊斯兰国”后，库尔德人利用混乱局面和美国的支持，在“反恐”战争中攻城略地，从“伊斯兰国”手中夺取了叙利亚北部边境一大片狭长地带，开辟了一个自治区，并谋求扩大自治权。其二，

① 刘辰、马晓霖：《土耳其叙北安全区政策的动因与走向分析》，第34页。

② “Bolton: US Troops will Not Leave Syria till Isis Beaten and Kurds Protected”, *The Guardian*,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9/jan/06/trump-bolton-syria-withdrawal-conditional>, 2019-01-06; “Bolton: US troops staying in Syria until Iran leaves”, *Defense News*, <https://www.defensenews.com/global/the-americas/2018/09/24/bolton-us-troops-staying-in-syria-until-iran-leaves>, 2018-09-24.

③ Mark Landler and Carlotta Gall, “As Turkey Attacks Kurds in Syria, U. S. Is on the Sideline”, *New York Times*, <https://www.nytimes.com/2018/01/22/world/middleeast/turkey-syria-kurds-us.html>, 2018-01-22.

④ Ash Carter, “Behind the Plan to Defeat ISIS”, *The Atlantic*, 2017-10-31.

⑤ Rod Nordland, “U. S. Exit Seen as a Betrayal of the Kurds, and a Boon for ISIS”, *New York Times*, <https://www.nytimes.com/2018/12/19/world/middleeast/syria-kurds-isis-us.html>, 2018-12-19.

专注于应对土耳其威胁。“伊斯兰国”被击溃后，叙库武装不愿意成为遏制巴沙尔政权、伊朗、俄罗斯的棋子。叙库武装远没有强大到四面树敌的地步，与更多对手对抗只会快速耗散自身资源而陷入险境。因此，叙库武装的优先目标是抵抗土耳其入侵，不愿意为美国更广泛的战略目标而努力。其三，逆向选择（adverse selection）。“伊斯兰国”溃败后，美国仍要依仗“叙库武装”从事其他议程，后者因此意识到自身的“剩余价值”，进而产生借力美国以获取持续援助的动机。一旦美国向叙库武装提供资源，后者将优先确保这些资源投入到自主议程，如追求自治和领土巩固。此外，叙库武装领导层还夸大“伊斯兰国”死灰复燃的危险性，以此寻求来自美国的长期援助。^①

此外，土耳其因素也加剧了美国与叙库武装的利益分化。2015年后，美国的叙利亚政策重点从政权更迭转向支持库尔德武装打击“伊斯兰国”，这种转变导致美国很快面临微妙的处境：在与叙利亚库尔德武装合作的同时保留土耳其作为对抗俄罗斯和伊朗不可或缺的盟友地位。美国“两头下注”的做法引起土耳其不安，土耳其担心叙库武装在叙利亚北部取得的进展可能将库尔德人聚集区连成一片，并助长本国库尔德人的野心。^② 叙利亚库尔德人若在内战结束后建立起一个基本独立自主的自治区，这对土耳其是一个“真正的战略威胁”，埃尔多安“不愿看到库尔德人获得合法性或任何形式的支持”。^③ 与此同时，2016年7月土耳其发生未遂军事政变后，埃尔多安试图通过强化库尔德问题的紧迫性来化解内部政治危机。因此，土耳其的叙利亚政策重心开始从颠覆巴沙尔政权转向遏制、打压和分裂库尔德武装。由此，土耳其抛开西方主导的日内瓦进程，与俄罗斯、伊朗构建阿斯塔纳机制并共建冲突降级区，这种密切的合作导致美国在叙利亚北部的角色被边缘化。鉴于打击“伊斯兰国”紧迫性下降以及土耳其的安全焦虑上升，美国担心继续支持叙库武装会使俄土接近，加剧美土关系紧张，美土矛盾失控可能导致后者偏离北约框架并破坏北

① Ben Hubbard, Charlie Savage, Eric Schmitt and Patrick Kingsley, “Abandoned by U. S. in Syria, Kurds Find New Ally in American Foe”, *New York Times*, 2019-10-13.

② “Turkey Deploys More Tanks in Syria, Warns Kurdish YPG”, *Aljazeera*,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16/08/turkey-deploys-tanks-syria-warns-kurdish-ypg-160825131652728.htm>, 2016-08-26.

③ Grace Segers and Kathryn Watson, “Trump Repeatedly Says Kurdish Allies are Not Angels”, *CBS News*, <https://www.cbsnews.com/news/trump-meeting-italy-president-sergio-mattarella-white-house-today-live-stream-2019-10-16>, 2019-10-16; Henri J. Barkey, “The Future of the Kurds in Syria”,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 Nov. 14, 2019.

约集体行动和凝聚力，那将从根本上动摇美国在中东、高加索地区的战略存在和北约的南部支撑点。于是，美国强调对叙库武装的援助在不破坏美土关系的前提下进行，包括时任美国参联会主席约瑟夫·邓福德（Joseph Dunford）在内的高官多次保证叙库武装获得的援助不会用于对付土耳其。美国支持土耳其在叙北建立安全区，既可以为反巴沙尔叛军和数百万叙利亚难民提供庇护，也可以削弱叙库武装以缓解土耳其的安全焦虑，避免叙利亚北部局势失控。尽管美国面临两难境地，“既要努力不疏远库尔德人，也要尽量不疏远土耳其。但华盛顿最终选择了安卡拉”。^① 土耳其看清美国“底牌”后，不断干扰美国与叙库武装的代理关系，迫使美国在击溃“伊斯兰国”后疏远叙库武装。

（二）“去能”：限制叙库武装的发展

在打击“伊斯兰国”的过程中，“叙库武装”在美国实施的“赋能”激励下，从一个被边缘化的少数民族变成了叙利亚暂时的强大行动者。^② 叙库武装控制了叙利亚东北、西北约1/3的叙利亚领土和一半的石油储备，这是库尔德人在叙利亚内乱中取得的最大进展。叙库武装不断通过反恐行动强化其合法性，并借助外部援助发展自身实力，在叙利亚和地区舞台上扮演着极其微妙的政治和安全角色。^③

当共同敌人被击溃，美国对叙库武装的预期随之发生变化：美国担心一个实力不断强大并追求自治的叙库武装变得不可控，埋下诸多隐患。其一，引发持续内乱。从长远来看，不断壮大的库尔德武装会挤压其他势力并引发持续的冲突，那意味着美国未来必须付出更大的努力去结束规模更大的内战。而且，只要叙利亚的冲突得以继续，“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分支等“圣战”团体就会从混乱中找到成长的沃土。^④ 其二，刺激冒险主义。当紧迫威胁解除后，继续扶植不断壮大的叙库武装可能会纵容其冒险行为。拥有大量武器装备和经战火洗礼后的叙库武装可能在激进民族主义的煽动下进一步通过暴力手段进行抵抗，最终走上土耳其库工党的老路，支持叙库武装无疑存在严重的长远隐患。^⑤ 其三，强化自主性。更强大的叙库武装更有能力和资源去追

^① Zachary Laub, “Syria’s Civil War: The Descent Into Horror”,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Oct. 23, 2019.

^② Lara Aziz, “The Syrian Kurds in the US Foreign Policy: Long-term Strategy or Tactical Ploy?”, p. 23.

^③ 王琼：《叙利亚库尔德武装的性质及其影响探析》，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7年第6期，第80~84页。

^④ Seth G. Jones etc., “Rolling Back the Islamic State”, RAND, 2017, p. 102.

^⑤ 王琼：《叙利亚库尔德武装的性质及其影响探析》，第82页和第89页。

求独立。在这方面，伊拉克库尔德人在美国那里留下了“负面”记录。^①叙库武装是否重蹈覆辙自然引起美国高度重视。此外，叙库武装的成功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刺激中东库尔德民族分裂主义和独立运动浪潮。2016年12月底，叙利亚库尔德人重申了罗贾瓦（Rojava）计划，这份蓝图相当于一部向区域自治迈进的宪法草案。然而，库尔德人的政治愿景很难落实，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柯比（John Kirby）明确指出：“我们不支持在叙利亚境内建立自治、半自治地区”。^②

为规避上述风险，美国试图采取“去能”激励策略，使叙库武装回到力量适度且顺从的代理人角色。美国逐渐限制叙库武装的发展，对叙库武装取得的军事进展保持警惕，因此在武器援助上设法管控，给库尔德人提供的大多是轻型武器。此外，放任土耳其削弱叙库武装也成为美国的政策默契。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曾借助萨达姆之手削弱伊拉克库尔德力量，在叙利亚，美国故伎重演，试图借助土耳其削弱叙库武装。在2017~2020年，土耳其为在叙利亚北部边境建立安全区而极力驱离叙库武装，先后发动代号为“幼发拉底河之盾”（2016~2017年）、“橄榄枝”（2018年1月）以及“和平之泉”（2019年10月）等军事入侵行动，造成数十万库尔德人流离失所。美国并没有阻止入侵发生，实则支持了土耳其。在“和平之泉”行动前夕，土耳其甚至收到了美国侦察机的监控录像，这些信息可帮助土耳其追踪库尔德人的位置。^③与此同时，特朗普与埃尔多安沟通后宣布撤军，为土耳其入侵叙利亚北部“开绿灯”，这被库尔德武装认为是“置我们于被屠杀的境地”和“背后捅刀”行为。^④2019年11月，特朗普在白宫接待埃尔多安，进一步强化了美国支持土耳其的态度。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的索内尔·卡帕特（Soner Çaaptay）则指出：“在不久的将来尽管美国还会支持叙利亚库尔德人，但倾向削弱叙库武装，以

① 赵建明：《伊拉克库尔德对美的游说与各方在独立公投上的多重博弈》，载《美国研究》2019年第4期，第77~84页。

② Rodi Said, “Syria’s Kurds Rebuked for Seeking Autonomous Region”, *Reuters*,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mideast-crisis-syria-federalism/syrias-kurds-rebuked-for-seeking-autonomous-region-idUSKCN0WJIEP>, 2016-05-17.

③ Ben Hubbard and Carlotta Gall, “Turkey Launches Offensive Against U. S. - Backed Syrian Militia”, *New York Times*, <https://www.nytimes.com/2019/10/09/world/middleeast/turkey-attacks-syria.html>, 2019-10-09.

④ Nabih Bulos, “Why are Syria’s Kurds Accusing the U. S. of Betrayal?”, *Los Angeles Times*, Oct. 7, 2019; Barbara Starr and Ryan Browne, “Military Leader of Syrian Kurds Tells US’ You are Leaving Us to be Slaughtered”, *CNN*, <https://edition.cnn.com/2019/10/12/politics/syrian-kurds-us-turkey-military-operation/index.html>, 2019-10-12.

便为土耳其与‘库尔德工人党’和平谈判创造潜力”。^①

总之，叙库武装从打击“伊斯兰国”的过程中走向强大，且更有能力追求自主性目标。这种态势致使美国对叙库武装采取“去能”激励以限制后者的能力和野心。

四 监督困境与委托-代理关系的瓦解

“伊斯兰国”溃败后，特朗普政府不愿顾及叙库武装的利益，叙库武装从美国的战略棋子沦为“弃子”。共同威胁消除和利益分化，进一步传导至委托-代理关系上，刺激了美国与叙库武装展开双向博弈：美国对叙库武装的监督效力遭到挑战；叙库武装产生了复杂的偏离反应。由于美国难以化解监督困境，叙库武装的自主性遂得以进一步强化，最终导致委托-代理关系“有形无实”，趋于瓦解。

（一）此消彼长：更弱的监督与更强的自主性

压缩“信息差”和督促代理人采取集体行动是施动方监督代理人的重要手段。但是，美国日益面临监督困境的挑战。

第一，美国与叙库武装的信息不对称（information asymmetry）加剧，这为后者拓展自主性创造了条件。在代理人战争中，信息不对称主要是指代理人通常对如何执行代理议程有深入的理解，而施动方对代理人知之甚少，双方之间就产生了“信息差”。信息不对称可能会鼓励代理人在追求自身目标的同时，偏离施动方的指示，同时仍然获得代理关系带来的好处。信息不对称导致施动者面临管理委托-代理关系的难题，“尽管委托人希望代理人完全像自己一样履行职责，但是鉴于两方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这不太可能发生，因为代理人更了解自己的偏好、自己的表现以及手头的任务”。^②当“伊斯兰国”被严重削弱后，美军不再需要维持在叙利亚北部地区长期行动，逐渐降

^① Soner Çaaptay, Director of the Turkish Research Program at the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 interviewed by Esra Gürçay a Intern at Middle East Policy Council, “The U. S. - YPG Relationship: U. S. Foreign Policy & the Future of the Kurds in Syria and Turkey”, Middle East Policy Council, <https://www.mepc.org/commentary/us-ypg-relationship-us-foreign-policy-future-kurds-syria-and-turkey>, 2021-10-04.

^② Ora Szekely, “A Friend in Need: The Impact of the Syrian Civil War on Syria’s Clients”,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Vol. 12, No. 3, 2016, p. 452.

低了对该地区事态发展的关注度和情报资源投入。美国因此无法近距离、及时地对叙库武装的自主行为进行“侵入式监督”，加剧了信息不对称困境。^①

在反恐战争中，构建地面信息与情报网络是开展有效行动的前提。美军联合特种力量向美国国防部提交的报告中建议开发以地面为重点、以人为基础的情报网络，为地面伙伴提供更多的训练、装备并协助他们开发新的能力，在当地民众中建立信任和信誉，以对抗“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建立的“复活单元”（resurgent cells）和叛乱能力。在打击“伊斯兰国”方面，美军根本不可能获取高质量的地面信息，正如美国防长卡特所言，美军“关于‘伊斯兰国’的情报几乎完全缺失”。^②相对而言，叙库武装具有本地化优势（外貌、语言、地形、风俗文化）和社会网络资源，这可以弥补美军在信息收集上的先天不足。例如，叙库武装在协助美军追捕、杀死伊斯兰领袖巴格达迪的过程中提供了关键情报。2019年10月，美国领导的全球打击“伊斯兰国”联盟前总统特使布雷特·麦格克坦言：“几乎所有在叙利亚针对‘伊斯兰国’重要领导人的特种部队行动信息，都出自我们的合作伙伴（主要是库尔德武装）和地面来源。”^③而随着“伊斯兰国”的主力被消灭后，特朗普政府不愿意继续维系由库尔德人建立的庞大地面情报系统。^④此外，土耳其支持的阿拉伯叛军不断驱散之前能够提供信息的库尔德情报人员，导致美国感知战场的具体态势变得更加困难。^⑤

美国不断削减在叙利亚北部地区的直接存在，实则加大了美军在该地区陷入信息“黑洞”的风险，而叙库武装则从不断弱化的监督环境中获得更大的信息优势和自主性空间。由于美军逐渐撤离，其在叙利亚北部地区收集反恐情报的能力日益下滑，为掌握“伊斯兰国”残余力量的动向，美国不得不

① 在委托-代理关系中，“侵入式监督”是指委托方进入现场直接监督代理人的行为，这类监督比较严格，往往可以及时发现并纠正代理人超出授权的自主行为，是一种常见的、有效的深度监督方式。

② Ash Carter, “Behind the Plan to Defeat ISIS”, *The Atlantic*, Nov. 1, 2017.

③ Brett McGurk Said in the NPR Program, “Landmark U. S. Raid In Syria Killed ISIS Leader in Northwest Syria”, <https://www.npr.org/2019/10/28/774016929/landmark-raid-in-syria-killed-isis-leader-brett-mcgurk-says>, 2019-10-28.

④ Shawn Snow, “Loss of US Intelligence Collection from Syria Withdrawal Threatens Fight against ISIS”, *Military Times*, <https://www.militarytimes.com/flashpoints/2019/10/18/loss-of-us-intelligence-collection-from-syria-withdrawal-threatens-fight-against-isis>, 2019-10-18.

⑤ Ben Hubbard, Charlie Savage, Eric Schmitt and Patrick Kingsley, “Abandoned by U. S. in Syria, Kurds Find New Ally in American Foe”, *New York Times*, <https://www.nytimes.com/2019/10/13/world/middleeast/syria-turkey-invasion-isis.html>, 2019-10-13.

继续依赖叙库武装的地面信息，叙库武装信息不对称优势更加明显。后者不仅获得相对宽松的监督环境，还因此获得“信息重构”（如夸大或虚构“伊斯兰国”残余力量的威胁）杠杆，来反向干扰美国的叙利亚北部地区政策，使之有利于库尔德人实现多重目标：挽留美军继续协防库尔德人社区，阻挠土耳其入侵；谋求美国承认库尔德人在叙利亚东北部的自治权；攫取更多美国援助；邀请美国企业一道开发叙利亚北部地区的石油资源等。

第二，美国难以督促碎片化的叙库武装采取集体行动，导致部分力量单元的自主行为不受控制。在代理人战争中，代理人常被简化为一个“黑箱”，实际上代理人内部的权力、观念和利益等结构异常复杂。代理人往往是由不同的利益单元（宗教派别、族群、政党等等）组成的集体，每个单元都有自己的忠诚力量，不同单元所具有的能力、资源、处境、观念也不同。如果代理人由不同利益诉求的单元组合而成，其应当被视为存在异质偏好的集体代理人。“当代理人本身就是一个集体时，相互冲突的忠诚可能会导致内部分裂”。^① 随着“伊斯兰国”被大大削弱，美国也无心为叙库武装提供长期庇护，后者原本脆弱的凝聚力遭到进一步削弱，其内部碎片化问题就凸显出来。

叙库武装是一个偏好异质的“伞形”组织，库尔德人民保卫军是该组织的主力，但它并未能将叙利亚阿拉伯联盟等其他少数群体完全整合起来。一部分力量单元倾向自主行动而非集体行动，致使美国监督它们在反恐框架下进行协同合作的设想变得不可能。其一，库尔德人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军原本就是松散的策略性联盟。为避免刺激土耳其，美国需要发展一个新的混合组织来稀释库尔德人的成分，以便于接受美国的援助。为形成强大战斗力和统一指挥反“伊斯兰国”力量，美国积极撮合库尔德武装与其他武装派别的联合。“军事和政治领域的迅速发展”要求“为所有叙利亚人组建一支统一的国家军事力量，包括库尔德人、阿拉伯人、叙利亚人以及其他团体”。^② 最终，一个军事上受人民保卫军领导的叙利亚民主军于2015年10月成立，它主要由库尔德人、阿拉伯逊尼派部落以及少量的亚述人、亚美尼亚人、土库曼人

^① Ora Szekeley, “A Friend in Need: The Impact of the Syrian Civil War on Syria’s Clients”,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Vol. 12, No. 3, 2016, p. 453.

^② Suleiman Al-Khalidi and Tom Perry, “New Syrian Rebel Alliance Formed, Says Weapons on the Way”, *Reuters*,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mideast-crisis-syria-kurds/new-syrian-rebel-alliance-formed-says-weapons-on-the-way-idUSKCN0S60BD20151012>, 2015-10-12.

和车臣人组建的十多个民兵武装团体组合而成。尽管库尔德武装可以引导民主军议程设定，但它是一个松散的组合，缺乏绝对指挥、控制权，像一个“不断变化的战术联盟”，库尔德人与阿拉伯人相互猜忌，难以达成共同目标。^① 因此，民主军内部的偏好异质问题对其凝聚力和行动一致性构成不小的挑战。此外，民主军具有流动、不确定的军事组织形态，特别是阿拉伯人和其他小规模武装团体的持续加入，使得民主军内部各派别的力量发展处于复杂的动态中。其二，叙库武装内部对美国的态度进一步分化。此前，一些阿拉伯武装叛乱团体与“基地”组织勾结在一起，遭到“伊斯兰国”威胁后，他们“摇身一变”成为反恐斗士。这些武装团体从被美国打击的对象转变为美国的帮手，这并不意味着它们真正践行“亲美”路线。实际上，“圣战”思想在阿拉伯军团中根深蒂固，他们一贯视美国为“入侵者”。其三，叙库武装内部对打击“伊斯兰国”有不同的理解。在与库尔德武装联手之前，一些阿拉伯武装派别的历史记录并不光彩，如“拉卡革命旅”（Raqqa Revolutionaries Brigade）和“卡萨斯军”（Jaysh al-Qasas），他们随时变换阵营，追求走私、劫掠等狭隘利益，有时还愿意跟“努斯拉阵线”“伊斯兰国”合作。这些机会主义者之所以与库尔德武装拼凑在一起，主要受到美国的撮合和“伊斯兰国”的威胁，恰如他们自己所言：“我们一边是库尔德人，一边是‘伊斯兰国’，所以我们应该选择谁？”^② 尽管“叙利亚阿拉伯联盟”在民主军旗帜下与“伊斯兰国”作战，但其中大约20%的人表示他们会保卫自己的土地，但不会对“伊斯兰国”发动进攻。^③

随着“伊斯兰国”被击败以及美国的叙利亚北部政策消极化，叙库武装在没有外部威胁和美国的积极撮合情形下，其内部固有矛盾开始凸显，并阻挠了集体行动。阿拉伯武装团体日益不愿意完全服从、信任库尔德人，甚至私自劫掠并与极端组织进行利益交换。此外，阿拉伯武装认为巴沙尔政权及其庇护者俄罗斯、伊朗是更大的威胁，它们夹在政府军和另外两个极端组织——

① Ben Hubbard, “New U. S. - Backed Alliance to Counter ISIS in Syria Falters”, *New York Times*, Nov. 2, 2015.

② “Sheikh Hmeidi Daham al-Jarba said to New York Times”, <https://www.nytimes.com/2015/11/03/world/middleeast/new-us-backed-alliance-in-syria-exists-in-name-only.html>, 2015-11-02.

③ Suleiman Al-Khalidi and Tom Perry, “New Syrian Rebel Alliance Formed, Says Weapons on the Way”; Ben Hubbard, “New U. S. - Backed Alliance to Counter ISIS in Syria Falters”, *New York Times*, Nov. 2, 2015; “The Syrian Democratic Forces: Just An Invention by Washington to Save Face?”, *Sputnik News*, Nov. 3, 2015.

“自由沙姆人伊斯兰运动”（Ahrar al-Sham）和“努斯拉阵线”之间摇摆不定。^①与此同时，一些极端组织趁机从叙库武装内部分歧中找到了渗透机会，推动叙利亚阿拉伯逊尼派部落区对库尔德武装的抵制。

（二）叙库武装的偏离

此前，美军可在情报和后勤方面协助叙库武装，并对潜在挑衅者形成威慑。2019年10月，特朗普与埃尔多安沟通后，宣布撤离叙利亚东北地区的2000多名美军。这一计划导致叙库武装获得的支持大幅萎缩，严重威胁其对叙利亚北部地区的控制。叙库武装既要北防土耳其入侵，又要南拒巴沙尔政权逼近，其叙利亚北部控制区还有数百万不安的少数民族和数千名“伊斯兰国”囚犯。与此同时，土耳其、伊朗、阿拉伯势力和极端组织也可能乘虚而入，争夺美军撤离后的真空。对此，民主军司令阿布迪抱怨：“一个伟大的国家怎么能在战斗中抛弃自己的盟友呢？在未来的任何战斗中，人们将如何信任美国人或与他们合作”？^②叙库武装领导层普遍认为，“在信任减少的背景下，库尔德人民保卫军领导的民主军与俄罗斯、巴沙尔的往来必须被理解”。^③由此，美国叙利亚北部政策的转向致使叙库武装面临更危险的境地，后者不得不更加自主地应对地区安全形势的恶化。

第一，叙库武装与巴沙尔政权合作。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时，库尔德人认为这是“阿拉伯人之间的内斗”，试图扮演伺机而动的“局外人”。2014年后，叙库武装尽量将其议程锁定为打击“伊斯兰国”，而非与巴沙尔政府军对抗。它不被大多数反对派视为一个反叛组织，甚至允许叙利亚政府军在其控制区落脚。而且，叙库武装一直与巴沙尔政权存在私下的石油交易，二者并不是隔绝、对抗的关系。^④随着“伊斯兰国”被逐渐击退，叙库武装在与阿拉伯反对派武装争夺胜利果实过程中，将巴沙尔政权视为潜在帮手。对巴沙尔政权而言，向库尔德人示好的背后基于三个关键目标：阻止土耳其入侵；

^① Barak Barfi, “Ascent of the PYD and the SDF”, The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 No. 32, April 7, p. 10.

^② Robin Wright, “How Trump Betrayed The General Who Defeated ISIS”, *New Yorker*, April 4, 2019.

^③ Matthew Ayton, “Amid US Uncertainty in Syria, Kurdish YPG Eyes Bolstering Ties with Russia”, Atlantic Council, March 23, 2020.

^④ Sarah El Deeb, “For East Syria, American Troops are about Much More than Oil”, *Military Times*, Nov. 10, 2019, <https://www.militarytimes.com/flashpoints/2019/11/10/for-east-syria-american-troops-are-about-much-more-than-oil>, 2020-12-08.

制衡土耳其在叙利亚扩大影响力；拉拢反击逊尼派叛军的盟友。^①事实也表明，叙库武装与巴沙尔政府奉行互不交战的权宜之计并在对抗土耳其问题上达成了默契。2017年9月，阿布迪接受《阿拉伯观察》（*Al-Monitor*）采访时首次表示愿意与巴沙尔政权合作，以换取在叙利亚建立联邦制以及北部业已存在的自治。^②叙利亚政府外交部长穆阿利姆（Walid Moallem）对库尔德人获得自治权的想法持开放态度，他表示：“这是可以协商的，可以成为对话的主题”。^③

第二，叙库武装寻求与俄罗斯进行合作。随着土耳其的军事推进和库尔德人伤亡的增加，库尔德人对美国的愤怒越来越强烈，普遍指责特朗普的举动是背叛。叙利亚北部安全形势急转直下，促使库尔德武装寻求新的庇护，其为数不多的选择是争取俄罗斯的军事和外交支持，以帮助它与巴沙尔政权达成和解或临时合作协议。在俄罗斯看来，库尔德人是牵制土耳其和分化美土关系的有效工具。莫斯科试图利用“叙库武装”的潜在价值，迫使安卡拉从北约联盟中后退。^④在俄罗斯的协调和担保下，巴沙尔政府军接管了此前由库尔德武装控制的多个北部地区。阿布迪与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在讨论叙北局势时表示，全力支持政府军在北部的行动。当然，叙库武装转向俄罗斯和叙利亚政府，可能是向土耳其施压，也可能是应对紧急危机的策略反应，其对莫斯科的最终动机深感怀疑，短期目标不一定代表它真正的长远利益。

第三，叙库武装在打击“伊斯兰国”方面转向懈怠。击溃“伊斯兰国”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叙库武装必须驻守“解放区”以防止后者卷土重来。然而，特朗普政府却默许土耳其进攻叙利亚北部，严重干扰了叙库武装打击“伊斯兰国”。为保护阿夫林（Afrin）和叙利亚北部其他地区的库尔德居民，叙库武装被迫优先应对土耳其造成的紧迫威胁而暂停打击“伊斯兰国”。此外，“伊斯兰国”囚犯看管问题也浮出水面。由于叙库武装北上反击土耳其，导致数百名“伊斯兰国”囚犯从无人看守的设施中逃脱。对此，前美国国家

^① “The Syrian Regime Reaches Out to the Kurds”, *Stratfor Analysis*, Sept. 2013, p. 71; 董漫远:《库尔德问题与中东局势》，载《国际问题研究》2017年第4期，第47页。

^② Amberin Zaman, “Syrian Kurdish Commander: We’re ‘Ready to Engage’ with Damascus”, *Al-Monitor*, <https://www.al-monitor.com/pulse/originals/2017/09/turkey-kurdish-commander-says-us-should-stay-in-syria.html>, 2017-09-26.

^③ “Syria to Consider Granting Kurds Greater Autonomy”, *Al-Jazeera*,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17/09/syria-granting-kurds-greater-autonomy-170926121821968.html>, 2017-09-27.

^④ Matthew Ayton, “Amid US Uncertainty in Syria, Kurdish YPG Eyes Bolstering Ties with Russia”.

安全委员会反恐事务高级主管约书亚·吉尔泽（Joshua A. Geltzer）认为，“释放这些在押人员将立即激发‘伊斯兰国’正在进行的重组”。^①因此，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Jens Stoltenberg）不得不敦促土耳其采取“克制的行动，确保在打击‘伊斯兰国’战斗中取得的成果不受损害”。^②全球打击“伊斯兰国”联盟前总统特使布雷特·麦格克则警告，“与美国人握手的价值正在贬值”，如果“伊斯兰国”重生，美国将难以找到为此而战的盟友。^③

总之，特朗普政府的叙利亚北部政策转向，不可避免地加剧了监督困境，助长了叙库武装的自主性。与此同时，叙库武装更加自主地应对地区安全形势恶化，偏离打击“伊斯兰国”的行动，以便节制资源应对来自土耳其的威胁，同时主动寻求与美国的地区对手巴沙尔政权、俄罗斯开展试探性合作。

五 余论

叙利亚内战无疑是世界上最血腥的冲突之一，“伊斯兰国”极端势力的崛起是这场内战的“衍生品”。紧迫的共同威胁促成美国联手叙库武装进行反恐代理人战争，但是它们并没有彻底解决委托-代理博弈的结构性矛盾。美国出于私利，将代价和风险转移给叙库武装，避免陷入大规模、深度的反恐战争陷阱，进而收割了巨大的代理收益。但事实表明，美国与叙库武装在目标和动机上的“理想点”并不重合，后者远非美国的“木偶”，而是有能力和动机偏离美国目标和谋取私利的能动性代理人。可以说，在利益分化、激励转向和监督困境三个维度的综合作用下，美国与叙库武装的委托-代理关系趋于瓦解，并产生诸多长期后果。

第一，代理人战争割裂了叙利亚原本的政治和安全版图，致使武装冲突持久化，阻碍了叙利亚各方推进和平进程。叙库武装在美国的“赋能”激励下，从反“伊斯兰国”战争中拓展了自主利益，不仅扩大了领土控制范围，增强了自身的军事实力，同时也在叙利亚未来政治进程中获得了更大的杠杆。

^① “Joshua A. Geltzer Said to New York Times”, <https://www.nytimes.com/2019/10/07/us/politics/turkey-syria-trump.html>, 2019-10-07.

^② Ben Hubbard and Carlotta Gall, “Turkey Launches Offensive Against U. S. - Backed Syrian Militia”, *New York Times*, Oct. 9, 2019.

^③ Jason Motlagh, “The Betrayal of the Kurds”, *Rolling stone*, Dec. 18, 2019.

可以说，叙库武装趁机坐大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一手推动的，这种变化对叙利亚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土叙边境的和平构成长远隐患。

第二，“伊斯兰国”被击溃后，美国与叙库武装利益不断分化，进而采取“去能”限制策略，并减少在叙利亚北部地区的军事存在。美国的叙利亚北部政策转向，刺激了美国与叙库武装双向博弈，强化了后者的自主性，严重削弱了美国承诺的可信度和对叙库武装的未来管控效力。

第三，通过地方代理人武装打击恐怖主义，折射出美国安全战略、军事思维上的调整，这种变化可能导致美国的海外干预低成本化、小型化、长期化。但是，代理人战争缺乏正当性和道义支撑，被普遍视为“灰色地带战争”“影子战争”或“肮脏战争”，严重挑战传统的国际关系准则，这进一步增加了运作代理人战争的代价，并将继续败坏美国的信誉。前美国国家反恐中心战略主任迈克尔·纳加塔（Michael Nagata）指出，中东地区普遍质疑：美国在叙利亚东北部的决定是否表明美国的可靠性在下降？美国在中东地区仍然是一个可靠的战略参与者吗？^①

这场反恐代理人战争隐含着更为普遍的规律：一是共同威胁只能在一段时期内塑造施动方与代理人的共同利益，“一旦施动方的目标已经实现，或者代理人不能维持原有的努力势头，那么施动方就会中止这种关系或者疏远代理人”。^② 二是任何代理关系的维系都意味着高昂的成本，精于算计的施动方欲驾驭拥有较高自主性的代理人，需不断向后者转移激励资源，代理“租金”将对施动方构成持久负担，也将挑战施动方的承诺可信度。三是施动方和代理人围绕控制与自主的角力必然加剧利益分化，进而导致施动方无法调和持续增长的结构矛盾，委托-代理双向博弈的动态平衡终将被打破。可以说，在利益、激励和监督“错位”的情形下，任何试图通过代理人战争来间接解除“麻烦”的施动方，始终难以克服委托-代理关系中固有的“软肋”，即管控代理人自主性困境，这极大地增加了运作代理人战争的复杂性和长期风险。

（责任编辑：樊小红 责任校对：詹世明）

^① John Walcott and W. J. Hennigan, “‘My Great and Unmatched Wisdom’: Trump Ignores Warnings on Syria Retreat”, *Times*, Oct. 7, 2019.

^② Amos C. Fox, “Conflict and the Need for a Theory of Proxy Warfare”, *Journal of Strategic Security*, Vol. 12, No. 1, 2019, p. 62.